

天監初南傳所謂《漢書》「真本」探討**

李 廣 健*

摘 要

南北朝（420-589）期間《漢書》的研究大為興盛，成為南朝其中一項史學特色。梁初出現了據說從北方南傳的《漢書》「真本」，本文嘗試以《漢書》「真本」為討論對象。文中探討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的學術背景，包括史學著作、目錄編纂、藏書數量等層面的差異。繼而對《漢書》「真本」的流傳、整理及其形式加以分析，最後探討《漢書》「真本」南傳前後的《漢書》研究。希望藉此可以對南北朝的學術環境，以及史學發展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

關鍵詞：漢書、真本、南北朝、史學、蕭琛

一、前 言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也是史學興盛發展的階段。其中犖犖大者約有以下幾點：南北學者專門參與歷史編纂的人數較前大增，史學著作的體裁呈現出多樣化，史書數目亦大幅成長，¹ 史學更從經學中獨立出來

2014 年 6 月 13 日收稿，2015 年 3 月 4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本文原以〈南北朝時期南傳的「真本」《漢書》〉為題，宣讀於「東亞古文獻的流通和文物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院主辦，2014.4.25），後經大幅修改內容，並更改為今題。本文審查期間獲匿名審稿人提供多項寶貴建議，於此謹致謝意。

1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沈剛伯先生文集》（上）（臺北：中央日報出版社，1982），

自成一格。²

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發展的同時，南北兩地的史學又出現各別的特色，³其中之一就是南方興起的《漢書》研究風氣。《漢書》自問世後，成為學者研習的對象，歷久不衰。瞿林東先生最先注意到隋、唐之際的一個學術現象，即隋、唐之際研究《漢書》蔚為風氣，他針對這個歷史現象進行研究，⁴並就當時出現研究《漢書》的一批學者，以及由隋朝蕭詒、包愷，唐初顏氏叔侄、秦氏兄弟形成的研究潮流，加以分析探討。瞿林東指出，隋唐之際統治階層的支持，是《漢書》研究興盛的主因。他並注意到隋、唐之際《漢書》研究的興起，是當時史學發展的一個特色，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其後，張榮芳更進一步，⁵探討這個歷史現象的淵源，追溯到魏晉時期。分別從經史分離、統治階層借鏡、師法傳承、史學教育需要，以及正統觀念接近儒家經典意義等層面，說明魏晉以降《漢書》大受注意的原因，從而更全面、更廣泛地分析了《漢書》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而在南北朝《漢書》流傳的過程中，南朝齊、梁之際有一股《漢書》研究的風氣興起，南齊是開端，及至梁而大盛。在梁朝剛建立時，出現了一篇據說從北方南傳的《漢書》〈敘傳〉，又叫《漢書》「真本」。⁶本文即試圖通過這份文獻，探討南朝學術與史學的特色。由於有關這份文獻的記載相當簡略，過去甚少受到學者的注意，⁷因此本文希望透過這份南傳的文獻，探討

頁 64、67。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時代特質〉，《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3-13。

2 遼耀東，〈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頁 253-276。

3 周一良，〈略論南北朝史學之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 77-105。胡寶國，〈南北史學異同〉，《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186-213。

4 瞿林東，〈隋唐之際的《漢書》學〉，《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119-123。

5 張榮芳，〈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青峰出版社，1991），頁 289-311。

6 這份文獻在史籍中或稱「真本」、或稱「《漢書》真本」、或稱「古本」，本文為免混淆，一律稱之為《漢書》「真本」。

7 蕭鳴籟，〈《四庫提要》中關於《漢書》古本問題之附註〉，收入陳新雄、于大成主編，

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作為《漢書》「真本」出現的背景，當時南北兩地在政治上處於長期分裂，造成學術上分途發展，這對兩地史學著作、目錄編纂，以及圖書累積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南北兩地的圖書呈現出不同的數量，在南北圖書收藏不同的情況下，南北兩地的文獻、圖書流傳趨勢為何？在這種趨勢下，《漢書》「真本」南傳有何特別意義？

第二、從政治上對峙下的南北圖書流布來看，南傳《漢書》「真本」通過甚麼途徑、經過何人傳入南方？整理過程如何？現存記載可否重建這份文獻的輪廓？並回應學者提出的疑問？

第三、南傳《漢書》「真本」出現於梁朝初建，也正是南北朝南方興起《漢書》研究新風氣的時候，換一個角度來看，探討南方《漢書》研究的興起過程，是否有助對南北兩地的學術有更深入的掌握？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本文試圖要探討的問題。本文希望對《漢書》研究發展過程中的特定階段，尤其南朝齊、梁之際的學術環境與表現，有一個較深入的了解。同時，希望藉此勾勒出南朝史學其中一部分的輪廓。

二、《漢書》「真本」南傳的學術背景

梁朝剛建立時，出現了一份南傳的文獻，《梁書》〈蕭琛傳〉記載：

天監元年，〔蕭琛〕遷庶子，出為宣城太守。徵為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為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賁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行也，以書饌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⁸

據說「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本文沿用其名稱之為《漢書》「真本」。

《漢書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76），頁13-21。

8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6，頁396-397。文中《漢書》〈序傳〉即《漢書》〈敘傳〉，本文正文一律稱《漢書》〈敘傳〉。

「真本」一詞，乃「手稿」、「原本」之意，不能望文生義，更絕非真假之謂。《漢書》「真本」出現於蕭琛宣城太守任上，他在天監元年（502）擔任此職，「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因此，蕭琛獲得這份文獻的時間，應該在天監元年或二年（503），即梁朝剛建立時。

在南北長期分裂下，南北雙方在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等層面，都出現各自發展的情況。經過日積月累，南北學術上的差距和特色益形明顯。通過當時文獻、圖書南來北往的傳布，多少可反映兩地學術發展的特色。

《南齊書》〈王融傳〉記載了兩件關於圖書、文獻傳布的事。首先是北魏孝文帝的「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⁹而《隋書》〈經籍志〉則留下一條線索，登錄了一本《魏闕書目錄》，¹⁰從書名和只有一卷來看，似乎不是有系統的著作，或許僅是一批有待搜尋的圖書清單。姚振宗便認為「案此一卷因借書而流傳江左，時當齊明帝建武中」。¹¹若姚氏之說可信，這一卷《魏闕書目錄》就是北魏向南齊商借的書單。

姚薇元和牟發松兩位先生都曾探討過北魏借書之事，並對事發時間作過考證。¹²姚薇元認為在南齊永明二年（北魏太和八年，484）；牟發松則以《南齊書》〈王融傳〉所列北方官員任職的時間排比分析，認為當在南齊永明七年（太和十三年，489），永明七年之說當可接受。王融雖主張借書，但是建議未獲通過。而《隋書》〈經籍志〉又稱「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¹³同樣是孝文帝，同樣向南齊借書，顯然與〈王融傳〉記載同屬一事，而結果則相反。關於〈經籍志〉的記載，牟發松指出「在時間上亦與史實不合。……北魏遣使求書時，孝文帝尚未遷都，而自太和十八年冬正式遷都洛陽後，魏齊再度失和，兩國間不再通使」。所以「徙都洛邑，借書於齊」

9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47，頁 818。

10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33〈經籍志·史部·簿錄類〉，頁 991。

11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5428。

1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內篇第三〈內入諸姓〉「苟氏」條，頁 62-64。牟發松，〈王融《上疏請給虜書》考析〉，《武漢大學學報》1995.5: 29-32。

13 《隋書》，卷 32〈經籍志序〉，頁 907。

是誤載。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憑空出現「祕府之中，稍以充實」的結果。他認為「孝文帝雖未向齊借到副書，卻並沒有放棄訪求圖書的努力。遷洛翌年即太和十九年六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南北民間書籍的交流更以各種途徑在不斷進行，……遷都洛陽以後，南北交流更加便捷，《隋志》稱遷洛以後魏祕府書籍『稍以充實』，則是事實」。¹⁴ 孝文帝在太和十三年借書不果，直到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後，「祕府之中，稍以充實」，這些新得圖書，其中一部分應該仍是從南方傳入，間接說明南北官方在中斷接觸後，兩地圖書的傳布還是進行不息。

其次，是永明十一年（493）王融以主客郎身分，接待北魏使節房景高、宋弁一行。過程中房景高、宋弁提及王融的〈曲水詩序〉已在北方流傳，並且獲得好評，深受時人稱道。〈曲水詩序〉成於永明九年（491）三月，則其傳入北方的時間，距面世時間相當接近。¹⁵

《魏書》〈崔鴻傳〉記載了另一件圖書傳布的事：

〔崔〕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子子元……乃奏其父書，曰：「……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¹⁶

崔鴻撰寫《十六國春秋》時，因知道常璩撰有李雄父子據蜀的史書，可是該書在南方完成，北方未曾得見。崔氏曾擬「乞敕緣邊求採」，希望通過政府協助在南北緣邊搜求採購，然終未提出請求。最後，在正光三年（522）覓得，雖然未交代尋獲該書經過，以常理推斷，應不離「緣邊求採」的作法。

酈道元《水經注》也具體反映了南北之間文獻、圖書的傳布，書中引用

14 牟發松，〈王融《上疏請給虜書》考析〉，頁 30。

15 《南齊書》，卷 47 〈王融傳〉，頁 821。

16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67，頁 1503-1505。

資料甚多，其中可考的南朝作品共 27 種，其中包括梁朝孫柔之《瑞應圖》、沈約（441-513）《宋書》、任昉（460-508）《地記》，以及吳均（469-520）〈劍騎詩〉。¹⁷ 段熙仲的研究指出酈道元生於皇興三年（469），卒於孝昌三年（527）。¹⁸ 與沈約的生存時代相約而稍晚，和任昉、吳均則是同時代的人，酈道元撰寫《水經注》時，已徵引他們的著作，說明南方圖書流布到北方的速度相當快。

其實，這些文獻、圖書的流傳是在南方典籍數量遠超北方的背景下出現。顏之推在〈觀我生賦〉的自注中指出：

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¹⁹

嚴式誨認為「『北於』疑『北方』之誤」。²⁰ 按此意思江東圖書為北方三倍。生當南北朝後期的顏之推，歷經梁、北齊、周、隋不同政權，足跡遍及南北，並在北齊敗亡入周之時寫下〈觀我生賦〉。²¹ 其言出於親身經歷，數量來自仔細觀察，故此他所留下的描述乃當代人的紀錄，相當可靠。

隋朝牛弘在追溯南北分裂後圖書累積的數量，有下一段話：

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²²

雖然牛弘並未提及南方的情況，但是以文中描述北朝齊、周官方藏書量來看，

17 鄭德坤，《水經注引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24、122、208、430。

18 段熙仲，〈《水經注》六論〉，收入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 3414。

19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45〈文苑·顏之推傳〉，頁 622。

20 北齊·顏之推，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附錄二〉，頁 684，註 20。

21 王利器根據顏之推「予一生而三化」自注調「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認為「據此，則此賦作於齊亡入周之時」。《顏氏家訓集解》，〈附錄二〉，頁 704，註 1。

22 《隋書》，卷 49〈牛弘傳〉，頁 1299。

再配合上引顏之推的話，可以看出南朝官方藏書，即使經過梁末散逸重新收集，數量上仍然以倍數計超出北朝齊、周政權官方藏書的總和。牛弘曾倡議隋朝開獻書之路，對典籍素有注意，且以北人身分論北朝官方收藏，時代距離不遠，其言當信而有徵。

成書於唐朝的《史通》，在〈探頤〉篇中側重比較南北兩地編纂當代史籍的數量：

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魏）收矯（崔）鴻之什，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²³

如果以涉及南方政權與北方政權的史著加以比較，數量約為三比一。即使這裡僅針對史部典籍作比較，而南北政權在史籍編纂上呈現的趨勢，仍與上引顏之推南北官方藏書比例相若。劉知幾作為總結六朝以來史學發展的《史通》作者，他對南北史籍數量的描述，自當有權威的地位。

通過南北朝、隋、唐學者不同角度的觀察描述，共同透露出一個結果：南朝官方藏書和史籍編纂數量，都較北朝官方為多，且呈現出倍數計的差距。而通過不同學者、不同視角的描繪，這個結果無疑是客觀的事實。

筆者過去涉及南北朝史學著作、目錄編纂與私人藏書的研究，都與上述觀察吻合，說明南方典籍數量遠遠超過北方，乃是客觀的事實。首先，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登錄的著作為基礎，得出以下結果（表一）：²⁴

表一 《隋書》〈經籍志·史部〉南北兩地著作數量表

南朝學者著作	225 種	6223 卷
北朝學者著作	42 種	1207 卷
入北南朝學者著作	20 種	219 卷
書名關涉南朝著作	52 種	2115 卷
書名關涉北朝著作	15 種	401 卷
總 數	354 種	10165 卷

23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上冊，卷7，頁287。文中所稱「偽邦」，據劉知幾在此之前提及「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卷7，頁286），所指當為北方諸政權。

24 本表依據李廣健，〈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經籍志》的形成——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分析對象〉，收入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隋書·經籍志·史部》南北兩地著作數量表」，頁297。

從上表可見，無論從種數和卷數來看，南朝史學著作的數量，都以倍數計超出北朝。

其次，如果以目錄編纂作為圖書累積的反映，南朝共有官私目錄十三部，其中《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收書 14582 卷、《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收書 15074 卷（一作 15704 卷）、《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收書 180108 卷、《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錄》收書 23106 卷、《七錄》收書 44521 卷。從收書的卷數可看到有增加的趨勢。而北朝僅得《甲乙新錄》、《魏闕書目錄》、《開皇四年四部目錄》、《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四部，而且前兩部似乎都不是完整有系統的目錄著作。因此，南北兩地的目錄編纂也存在嚴重的落差。²⁵ 最後，在私人藏書方面，南北朝相關史傳中，許多記載了當時民間藏書與博覽學者的情況。即使這類記載大多缺乏準確的藏量，僅提供一個大約的數字，但是私人藏書與閱覽數量南多於北，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南北兩地的相關統計如表二：²⁶

表二 南北朝私人藏書表

收藏數量	南朝人數	北朝人數
千餘卷		2
數千卷	3	2
四千餘卷		1
七千卷	1	
八千卷	1	
將萬卷		1
萬卷 / 篋	1	1
萬餘卷	4	1
二萬卷	3	
三萬卷	1	

南朝藏書之家和博覽學者，無論在人數和藏閱數量來說，都超越北朝。以「卷」為單位來計算，南方藏閱圖書量達到萬計的人數，合共有九人；而北朝則只

25 李廣健，〈許善心《七林》與南朝目錄學〉，《漢學研究》23.2(2005.12): 92，「附表一·南北朝編纂官私目錄及藏書數量表」。

26 李廣健，〈許善心《七林》與南朝目錄學〉，「附表二·南北朝私人藏書表」，頁 93。

有3人。²⁷另外，若排除「數千卷」這類數量指示模糊的情況，在南北兩地民間有相對精確藏閱數量的記載中，北朝藏閱量最少的兩例，只有千餘卷。擁有千餘卷的圖書便被列入史傳，作為博學的證據，多少代表北朝民間藏閱量相對較少，故此收藏圖書的最低數目可以作為指標。而在南朝的案例中，最少要有三千卷才能載入史傳，這亦透露出兩地民間藏書在數量上的差距。通過以上三方面的比較，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南北兩地學術條件存在明顯的差異。

一時一地圖書的數量當以圖書的生產，以及圖書的累積這兩個環節相加而成。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學者從事圖書編纂撰寫的工作，因此學者勤於著述自然會增加圖書產量，反之亦然，從而影響到這個時代的圖書數量。除此之外，每一個時代繼承和保留前代著作的多寡，亦即圖書的累積，同樣會影響到這個時代圖書的數量。從圖書生產的角度來看，南朝在某些領域一枝獨秀，北方難以望其項背，例如南朝史學蓬勃的發展，對於南方圖書數量的增加，無疑大有助益。

可是，從圖書累積的角度來看，北方保留東晉以前的著作，具有先天優勢，其地位無法取代。因為在永嘉之亂後，南方繼承和保留東晉以前的著作，除了少數例外，其餘都是在南北對峙形成前後從北方傳入。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記載了一則掌故：

《漢書》：「田冑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冑。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為『冑』。」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冑」。²⁸

劉顯是梁朝著名學者，其子劉臻恪守家學，劉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督，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精於《兩漢書》」。²⁹劉臻精於《漢書》，乃是出於繼承家業，劉氏父子家學淵源，都以《漢

27 北朝其中一例以「篋」計算，考慮到該例的數量亦相當龐大，因此與卷一併計算。

28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集解》，卷6〈書證〉，頁443-444。

29 《隋書》，卷76〈文學·劉臻傳〉，頁1731。

書》見稱於時。故此梁元帝雖然博學多聞，且曾注釋《漢書》，對於「田疇賀上」一句的用字，卻也「無以難之」。

這段記載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劉臻回答梁元帝的提問時，指出「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冢』」。表示劉氏家藏舊本，原文與江南通行本無異，乃是根據另一與顏之推至江北後所見《漢書》相同或接近之版本而改。及後，顏之推入北，獲得驗證這句話的機會，他發現江北「見本爲『冢』」，這說明劉家「舊本」在版本上的價值。而這「舊本」的淵源，應溯源於北方一個版本，因此才會與南方較流行的版本內容不同。從這個例子透露北方保存產生於南北對峙以前的著作，在版本上因淵源更早而具有不可忽略的學術價值。

除了劉家舊本，唐初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提及另一部《漢書》研究著作：

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³⁰

西晉時，晉灼完成《漢書集注》，未幾永嘉之亂爆發，北人南遷，而《漢書集注》卻沒有流傳到南方，因此南方學者一直無緣看到此書。在物以稀為貴的情況下，這些北方文獻、圖書在南方學者眼中，不難想像會具有相當吸引力。劉臻、晉灼兩例剛好都與《漢書》有關，如果加上《漢書》「真本」的例子，說明北方的圖書雖然在數量上無法與南方相比，然而仍有其重要地位。因此，南北雙方在圖書生產與圖書累積上實各有千秋。

《梁書》〈蕭琛傳〉記載南傳的《漢書》「真本」，便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出現。這篇文獻南傳，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永明年間，北魏官方試圖向南齊借書，同時王融作品流傳北方，都呈現文獻、圖書由南入北的需求與趨勢。及至梁朝，這種趨勢並未停止，崔鴻《十六國春秋》與酈道元《水注經》撰寫的時間相當接近，兩部著作都參考了流傳入北方的南方文獻、圖書。因此，南傳《漢書》「真本」似乎是南北朝文獻、圖書在由南入北為主的趨勢下，一個逆勢出現的例子。

30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

在此嘗試對上述趨勢下存在的一個矛盾現象加以說明，即江北作「田河賀上」的《漢書》版本，既有學術上的價值，為何遲遲沒有流入南方，而要等到顏之推至江北後，方才有機會看到？另外，晉灼的《漢書集注》為何「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呢？如果退一步來看這問題，或許可以問為何南北文獻、圖書的流傳趨勢，不能以對等或由北入南的方式進行？這其中可能涉及三個理由：第一、由於北方文獻、圖書數量稀少，因此擁有者益加珍視，形成一種不願輕易出借、割愛的心理，南方則適好相反。第二、由於資訊阻隔，南北之間無從確知對方的情況。第三、南北雙方在學術文化上漸漸形成一種重南輕北的趨勢，以致文獻、圖書的流傳傾向由南入北。³¹ 這三個理由可能同時發揮影響，這個現象或許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討論。

三、《漢書》「真本」的流傳、整理及其形式

蕭琛獲得《漢書》「真本」後，天監九年（510）他「以書饌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梁書》〈劉之遴傳〉的記載有助補充〈蕭琛傳〉內容：

太宗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³²

31 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收入《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63-414。李廣健，〈《漢書》顏注與貞觀朝儲位之爭〉，《新史學》8.1(1997.3): 24-33。《顏氏家訓》〈書證〉提及：「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頁440），可以作為這種趨勢的註腳。

32 《梁書》，卷40〈劉之遴傳〉，頁572-573。

〈蕭琛傳〉稱蕭範為「鄱陽王」，〈劉之遴傳〉則清楚指出他是「鄱陽嗣王」，其實當時鄱陽王是蕭範的父親蕭恢，蕭恢去世後蕭範才襲封為王。蕭恢與梁武帝是同父異母兄弟，稍早時進號平西將軍，³³ 是一位「美風表，涉獵史籍」的宗室。³⁴ 至於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³⁵ 史傳對他的學術評價似乎不高，或許是愛好附庸風雅之徒。行將出任平西長史的蕭琛，選擇此時此刻將祕藏《漢書》「真本」致贈「愛奇翫古」的蕭範，乃是細膩周全的舉措，且蕭恢有「涉獵史籍」的喜好，蕭琛的餽贈實在一舉兩得。傳中並未交代蕭範獲贈《漢書》「真本」後的反應，僅提及蕭範將其獻於東宮。

通過〈蕭琛傳〉與〈劉之遴傳〉，大致可拼出一個《漢書》「真本」的流傳過程：首先，一位不知名的北方僧人，把這份文獻帶到南方，跟著落入蕭琛之手，蕭琛保留了一段時間，然後將其轉贈蕭範，再由蕭範呈獻蕭統。蕭統得到《漢書》「真本」後，請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等人加以整理。昭明太子蕭統是一位勤奮好學的宗室，史載：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天監）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³⁶

蕭統博覽群書，聚書幾三萬卷，蕭範把《漢書》「真本」呈獻給他，也是投其所好。

後來，蕭統命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漢書》「真本」異同。

33 《梁書》不同地方的記載略有出入，〈武帝紀〉於天監七年（508）八月，〈太祖五王·鄱陽王恢傳〉則於天監八年（509）。《梁書》，卷 2，頁 47；卷 22，頁 351。

34 《梁書》，卷 22 〈太祖五王·鄱陽王恢傳〉，頁 350。

35 《梁書》，卷 22 〈太祖五王·鄱陽王恢附範傳〉，頁 352。

36 《梁書》，卷 8 〈昭明太子傳〉，頁 165-167。

劉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³⁷ 值得注意的是，〈劉之遴傳〉記載與他討論的人，包括劉顯、韋稜，這兩人都梁朝《漢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³⁸ 劉之遴能與他們討論，《漢書》應是其中一個論題。而且，〈蕭琛傳〉指出《漢書》「真本」「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而劉之遴「好古愛奇」，他獻給東宮的古器，就包括秦、兩漢時期的文物，且有篆銘等內容，對秦漢時期文字應有一定的掌握能力。請他整理《漢書》「真本」，可謂理想人選。至於張纘，其人「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³⁹ 張纘兄張緬即上文提及南方私人藏書量達萬餘卷的其中一人，張纘也是一位博覽學者。到溉「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為任昉所知，……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⁴⁰ 任昉是另一位南方藏書達萬餘卷的學者，傳中雖然未提及到溉的藏書，從蕭衍因「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⁴¹ 他似乎也有一些特別的藏書，故此引起蕭衍的雅興。史傳對陸襄的記載較少，「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⁴² 他在學術上應有一定表現，才會引起蕭統注意，啓請羅致為宮僚。蕭統延請他們整理《漢書》「真本」，應該是經過一番慎重挑選的。

劉之遴等人受命整理《漢書》「真本」後，以當時通行的今本《漢書》比較，〈梁書〉〈劉之遴傳〉記載了比較的結果：

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

37 《梁書》，卷 40 〈劉之遴傳〉，頁 572。

38 《顏氏家訓》謂「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顏氏家訓集解》，卷 6 〈書證〉，頁 443。《隋書》，卷 33 〈經籍志〉，頁 957。韋稜曾著《漢書續訓》，也是當時活躍的學者。《隋書》，卷 33 〈經籍志〉，頁 954。《梁書》，卷 12 〈韋稜傳〉，頁 225-226。

39 《梁書》，卷 34 〈張緬附張纘傳〉，頁 493。

40 《梁書》，卷 40 〈到溉傳〉，頁 568-569。

41 《梁書》，卷 40 〈到溉傳〉，頁 569。

42 《梁書》，卷 27 〈陸襄傳〉，頁 409。

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穀穀，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⁴³

劉之遴比較的結果，舉出了十個相異之處，〈劉之遴傳〉具體列出其中八點。《漢書》「真本」在比較之後，再也沒有其他學者提及目睹此書，在唐太宗、唐高宗時期編纂的《漢書》〈敘例〉與《隋書》〈經籍志〉，顏師古與史臣都不復提及這份文獻，或許在戰火中已經散佚。因此，後世只能通過〈劉之遴傳〉的比較，來了解《漢書》「真本」的內容。

由於《漢書》「真本」失傳，後世對其印象與研究興趣也就日漸淡薄，鮮少再被提及。⁴⁴ 及至清朝編修《四庫全書總目》時，特別針對劉之遴對《漢書》「真本」的比較作深入剖析，這則「《漢書》提要」由邵晉涵撰寫，他指出：

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文〈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敘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得姓以來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敘傳」二字確不可易，後代史家皆沿其例，改作「中篇」，此何說也？至云「彪自有傳」，則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斷宜入東漢傳，惟見於〈敘傳〉，故可於況、伯、旂、穉之後詳其生平，述其言論，

43 《梁書》，卷 40〈劉之遴傳〉，頁 573。

44 王應麟、錢大昕是其中的少數例子。宋·王應麟，清·公元圻等注，樂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中冊，卷 12〈考史〉，頁 1419、1421。錢大昕著有《困學紀聞校》，亦收入上書中。

若自為一傳則無卷可附，若以類相及，必《漢書》有光武紀及雲臺諸功臣傳而後可也，奚不考〈敘傳〉所云「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乎。之遴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此為分卷而言也，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若相合為次，已失固自言之次第，合百篇為三十八卷，亦略無義例，徒事紛更爾。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次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曰「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為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穀穀，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化為侯王，雲起龍驤。」然今本「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況〈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與今本同，在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審音辨義，代有其人，不意尚有謬託古本，欲顛倒其次第者，馴至庸妄之徒，謂班固不能文從字順，益不足與辨矣。⁴⁵

邵晉涵在八處相異的地方，指出了七個問題，並考證出《漢書》「真本」是一份偽作。

無獨有偶地，與邵晉涵約略同時的王鳴盛，亦注意到劉之遴參校異同的事，他在《十七史商榷》「劉之遴所校《漢書》」條指出：

考其所云「今本」者，則梁世所行之本，與今刻不異，既編次體例若是之參錯，則字句異者亦必甚多，乃僅舉〈韓彭〉敘述數句，恐之遴等亦未能全校耳云。⁴⁶

45 清·翁方綱等，《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書店，2006），頁452-454。

46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7，頁37。

從王鳴盛的篇題與行文內容來看，他顯然以劉之遴等人據之與「今本」校對的，乃是一部完整的《漢書》，故此對「之遴等亦未能全校」，不免覺得可惜。王鳴盛的看法其實不難理解。首先，因為劉之遴「具異狀十事」時，通稱《漢書》「真本」為「古本《漢書》」，並與「今本」逐一比較。「今本」是指南方通行的《漢書》，亦即王鳴盛所說「梁世所行之本」，這個南方通行本當然可以是完整的《漢書》。在「參校異同」的觀念下，很容易誘導人聯想到劉之遴既以「今本」來跟「古本」比較，這個「古本」自然應該與「今本」對等，換言之是一部完整的《漢書》，遂出現這種錯覺，實不足為怪。其次，劉之遴等人以古、今本比較的結果，範圍遍及本紀及表、志、列傳，這樣廣泛的比較，也很容易令人以為劉之遴等人拿來比較的，是兩部完整的《漢書》。

這樣的誤解主要由於把目光單單集中於〈劉之遴傳〉上。⁴⁷ 如果對照〈蕭琛傳〉，則答案便顯而易見。首先，兩傳內容清楚交代出《漢書》「真本」的來源，〈劉之遴傳〉指出「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蕭琛傳〉則指出「有北僧南度，惟賚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琛固求得之，……以書饒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把這兩段文字連接起來，便可清楚看出劉之遴等人「參校異同」的，就是蕭琛從北方僧人手上「固求得之」的《漢書》〈敘傳〉，在整個流傳過程中，並未提及有新增篇幅加入其中，因此顯然仍是原來的那份《漢書》「真本」。

其次，這篇《漢書》〈敘傳〉是由北方僧人藏於葫蘆攜帶南下，雖然〈蕭琛傳〉提到「紙墨亦古」，顯然是抄寫紙上，可是以一部《漢書》與一篇《漢書》〈敘傳〉抄寫於紙上的份量而言，前者明顯不可能儲存於葫蘆之中。而且，據劉之遴比較提及「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表示北方僧人帶來的這篇《漢書》〈敘傳〉，班氏家世中班彪的部分全被刪除。今《漢書》〈敘傳〉分為家傳、敘目兩部分，前者約 6800 字，涉及班彪的有 2000 字。按理來說，假如把班彪生平刪去，緊接其後的班固自應同時抽起，

47 在此要指出，邵晉涵、王鳴盛，甚至《四庫全書總目》引用的都是《南史》〈劉之遴傳〉，但是《南史》〈劉之遴傳〉除個別文字外，其餘全部出自《梁書》〈劉之遴傳〉，故本文討論時仍據《梁書》〈劉之遴傳〉。

否則班稚之後忽然插入班固，便變得不倫不類。若把班彪、班固生平都剔除，合計約 4800 字，全文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即使加上敘目的 8000 字，《漢書》「真本」的篇幅，約餘 10000 字，僅為原來篇幅三分之二。抄寫於紙上，完全可以藏於葫蘆中攜帶南下。

最後，《漢書》〈敘傳〉敘目的部分，有贊有述，詳列書中各篇概要，遍及本紀及表、志、列傳，無形中可藉此窺探全書結構與內容，因而據此一篇即可與「梁世所行之本」比較，而得出〈劉之遴傳〉「具異狀」的全部結果。因此，王鳴盛認為「之遴等亦未能全校」，假如他了解《漢書》「真本」的形式，便可知道這不過是一篇部分內容經過刪節後，抄寫於紙上的《漢書》〈敘傳〉而已。劉之遴等人要達到王鳴盛的期待去全校，遂有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的苦衷。

四、《漢書》「真本」南傳前後的《漢書》研究

班固撰寫《漢書》，「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⁴⁸《漢書》面世後，馬上受到學者的重視，劉知幾檢討《漢書》優點時，指出「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⁴⁹所以「學者莫不諷誦」。可是，學者諷誦《漢書》時，也面對一些困難，「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班）昭受讀」。⁵⁰結果，由作者之一的班昭親自教授，開啓了一套研讀《漢書》的方法。其後，在《漢書》流傳的過程中，正如顏師古所稱：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⁵¹

這些情況提供後世學者注釋、研究、整理《漢書》的空間。而《隋書》〈經籍

48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40 上〈班彪傳〉，頁 1334。

49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上冊，卷 1〈六家〉，頁 25。

50 《後漢書》，卷 84〈列女傳·曹世叔妻〉，頁 2785。

51 《漢書》，〈漢書敘例〉，頁 2。

志·史部·正史類〉小序簡介隋代以前的史學時，指出《史記》、《漢書》的發展情況：

《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⁵²

《漢書》研究逐漸蔚然成風，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漢書》研究已自成一格，成為專家之學。

《史通》〈古今正史〉更進一步指出：

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⁵³

顯示有眾多學者為《漢書》注解，與儒生注解《五經》的情況類似。關於注解《漢書》的情況，漢末迄陳之間「二十五家」可能只是其中一種說法，張振珮在箋注中指出：

《通釋》引顏師古《漢書》〈敘例〉云「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浦按云：「爵里文煩，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悅，服虔，應劭，并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皆不著代。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并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并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三人。合師古亦止二十四人，其一人不可詳矣。」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刊本校勘記云：「『二十三人』原作『二十二人』，『二十四人』原作『二十三人』。『一人』原作『二人』，按《通釋》遺漏李斐一人，故所計人數分別予以改正。」陳·《補釋》云：「荀悅非注解《漢書》之人。今考《漢書》〈敘例〉尚有李斐、臣瓚（按《補釋》原引有臣瓚），而見《隋志》者，尚有劉顯、夏侯咏、包愷等三家音，陸澄，劉孝標，梁元帝之注，蕭該之音義，韋稜〔稜〕之續訓，姚察之訓纂、集解、定疑，項岱之訓傳，無名氏之疏，合師古〈敘例〉及師古數之，共三十五家。（《唐書》：師古叔父游秦，亦注《漢書》。）宋景祐二年，余靖上言，顏師古總先儒注解名姓可睹〔睹〕三十五人，齊召

52 《隋書》，卷 33，頁 957。

53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下冊，卷 12，頁 428-429。

南考證謂三十五，係二十三傳寫之誤，是據今本〈敘例〉二十三人言之。王鳴盛以三十五作二十五，謂二十三人外，增師古及張佖。然張佖非唐人，不得入數。蓋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史通》所見二十五家，或今本〈敘例〉脫去二家，宋余靖所見，亦曰二十五誤三十五也。」按《史通》所云「注解《漢書》者二十五家」是「始自漢末，迄乎陳世」之注家。顏師古撰〈漢書敘例〉所列二十三人，始自漢末荀悅，迄乎北魏崔浩。應包括在二十五人之內，其中荀悅雖僅撰有《漢記〔紀〕》，但據宋祁曰：「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未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則以荀悅為《漢書》注家，自必有據，而知幾在敘例二十三人外，所增兩人，自非生才八歲而陳亡之顏師古。（師古生於陳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據《唐書》〈顏師古傳〉：「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則游秦似為北齊、隋唐時人。而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云「許慎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自顏注中者尚多，〈敘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則許慎，游秦，與陳、《補釋》所引劉顯、韋稜，姚察以上諸人，均可能為《史通》增補兩家中之人選。但已難確認孰是矣。⁵⁴

張榮芳的研究，羅列出隋朝以前 50 家、56 種注解，隋前《漢書》研究的盛況可見一斑。在南北朝階段，就有陸澄、崔浩、劉孝標、劉顯、梁元帝、韋稜、顧野王、姚察、袁峻、蕭琛、范曄 11 家、14 種注解。⁵⁵

《隋書》〈經籍志·史部·正史類〉小序簡介中，列出隋朝以前《漢書》的學者，包括梁朝劉顯、韋稜，陳朝姚察，三人都是南朝學者，名單中沒有指出任何北方的學者。如果這段文字因受簡介性質所限而遺漏了北方學者，則《隋書》〈經籍志〉的內容可以作為補充。《隋書》〈經籍志〉列出南北朝時期完成的《漢書》研究專著如下：

- （一）《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 （二）《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
- （三）《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 （四）《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

54 《史通箋注》下冊，卷 12，頁 431-432，註 10。引文中的標點曾略作調整，以便順利閱讀。

55 張榮芳，〈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頁 303-304。

(五)《漢書續訓》三卷(梁平北諮議參軍韋稜撰)

(六)《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七)《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八)《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九)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

(十)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

(十一)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

(十二)《漢書續》十八卷(范曄撰)⁵⁶

在這張名單中,范曄《漢書續》當為《後漢書續》之誤,應從名單中剔除。⁵⁷從中可以發現,隋朝蕭該、包愷出現前,其他十本整理與注釋《漢書》的著作,全部出自南方學者之手。這似乎說明前面引用小序的內容,不能用遺漏來解釋為何沒有列出北方學者這現象。

爲了更全面了解南北朝的《漢書》研究情況,以下嘗試從〈經籍志〉以外的典籍來搜索。結果,找到以下幾部著作:

(十三)崔浩《漢書音義》二卷⁵⁸

(十四)蕭琛《漢書文府》⁵⁹

(十五)顧野王《漢書音義》⁶⁰

56 《隋書》，卷 33〈經籍志〉，頁 953-954。

57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6〈經籍志上·雜史類〉登錄「《後漢書續》十三卷(范曄撰)」，頁 1994。《新唐書》有同樣記載，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8〈藝文志·雜史類〉，頁 1463。兩書均作《後漢書續》，令人懷疑《隋書》〈經籍志〉脫漏「後」字。雖然，《隋書》與兩《唐書》所記卷數不同，前者作十八卷，後者作十三卷，姚振宗推測「似有前論贊五卷在其中，此續為一編者歟？」《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頁 5243。但是，此書經歷隋唐兩代，部分內容可能已經散佚，故卷數較前減少。此外《隋書》〈經籍志〉排列《漢書續》的位置，乃是諸家《後漢書》、《范漢音訓》、《范漢音》、《後漢讀論》之後(卷 33，頁 954)；《魏書》、《吳書》、《吳紀》、《三國志》之前(卷 33，頁 955)，顯示作者按時間編列各書次序，因此范曄著作，當補一「後」字。而本書則應從上列名單中剔除。

58 《新唐書》，卷 58〈藝文志·正史類〉，頁 1454。

59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8〈蕭思話附蕭琛傳〉，頁 507。

60 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 2〈注引群書目錄上·正史類〉，頁 14，收入清·

(十六) 袁峻抄《漢書》二十卷⁶¹(十七) 張沖《前漢書音義》十二卷⁶²

名單上崔浩《漢書音義》為《漢紀音義》之誤，⁶³ 應從名單中剔除。張沖是隋朝學者，加入這四部著作，仍未能轉變隋朝以前《漢書》研究南方一枝獨秀的現象。另外，近人張儋生指出：

按《隋志》有夏侯詠《漢書音》二卷，《新唐志》及高氏《史略》均作夏侯泳。《舊唐志》則載夏侯侏《漢書》二卷，而脫音字。人名均異。詠、泳、侏，三字相近，殆傳寫舛誤耳，詠年代爵里無考，《隋書》既著錄，必隋以前人，茲次於姚察後以待考證。⁶⁴

夏侯氏姓名、年代、爵里不詳，而張儋生的推論結果卻頗為中肯。查夏侯氏的名字應作「詠」，⁶⁵ 當屬梁代人士，⁶⁶ 《隋書》〈經籍志〉登錄其著作而未標

顧修輯，《讀畫齋叢書》第1函第1冊（《百部叢書集成》第39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清嘉慶四年（1799）桐川顧氏刊本（甲集））。又參張儋生，〈漢書著述目錄考〉，收入陳新雄、于大成主編，《漢書論文集》，頁96。

61 《梁書》，卷49〈文學上·袁峻傳〉記載：「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頁689。

62 《隋書》，卷75〈儒林·張沖傳〉，頁1724。

63 《舊唐書》，卷46〈經籍志上·編年類〉登錄「《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頁1991。《新唐書》記載相同（卷58〈藝文志·編年類〉，頁1459）。而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羅列引用書目時，收入崔浩所撰《荀悅漢紀音義》，卻未見有《漢書音義》。既然顏師古已經注出崔浩的著作，似乎沒有理由要隱沒此書。唐代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崔皓〔浩〕注《漢紀》曰：『淚下無聲曰泣也。』」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3〈經卷第63·入法界品之四〉「涕泗悲泣」注引，頁8，收入清·潘仕成輯，《海山仙館叢書》第2函第6冊（《百部叢書集成》第60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清道光咸豐間番禺潘氏刊光緒中補刊本）；宋代李昉《太平御覽》引「崔浩《漢紀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682〈儀式部三·璽〉，頁7。）未見現存崔浩的注文中列出《漢書音義》或注《漢書》之名，因此令人懷疑兩書名稱僅「紀」、「書」一字之差，或本即一書，《新唐書》誤析為二，使人以為崔浩有兩部音義。所以，此書亦應從名單中取消。參朱祖延纂，《北魏佚書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頁44。

64 張儋生，〈漢書著述目錄考〉，頁24。按今標點本《舊唐書》〈經籍志〉亦作「泳」字。卷46，頁1988。

65 《顏氏家訓》曾提及一位夏侯該，王利器引用眾家注釋說：「宋本原注：『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宮傳凝本作『諺」、作『詠』未定。』」趙曦明曰：『案：《隋書》

明作者年代，故南北朝《漢書》研究著作名單中，應納入這部著作：

（十八）《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⁶⁷

經過上述搜集討論，前後合計得出 16 種南北朝完成的《漢書》著作。在隋朝蕭該、包愷、張冲出現前，南北朝所有整理、注釋《漢書》的著作，全部出於南方學者之手。

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這批南方《漢書》研究出現的時間。其中最早的著作，來自南齊陸澄。《隋書》〈經籍志〉登錄了南齊陸澄《漢書注》一卷與其注《漢書》一百二卷兩本著作。《南齊書》〈陸澄傳〉對這兩部著作全然不提，僅載「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⁶⁸ 按《隋書》〈經籍志〉登錄陸澄「《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以及「《雜傳》十九卷」，⁶⁹ 〈陸澄傳〉除了指出這兩本著作在陸澄「死後乃出」，其餘著作一概不提。陸澄卒於隆昌元年（494），適值南北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的日子結束，是年即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華化，隨之而來南北干戈再起，兩地官方往來中斷。「《漢書注》一卷」條下登錄「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⁷⁰ 這是陸澄仕宦生涯最後的職銜，⁷¹ 陸澄這一卷《漢書》注就算不是在「死後乃出」，也屬於

〈經籍志〉：「《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作「詠」為是。』劉盼遂曰：『案「該」為「詠」之形誤，《切韻》〈序〉敦煌本云：「夏侯詠《韻略》。」今本《廣韻》亦誤作「該」。《隋書》〈經籍志〉：「《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李涪《刊誤》曰：「梁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皆不作「該」。』《顏氏家訓集解》，卷 6 〈書證〉，頁 441，註 4。由此可知，張僊生質疑的「詠」、「泳」、「佖」三字，當以「詠」字為是。

66 劉盼遂引李涪《刊誤》稱夏侯詠為梁人，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刊誤》提要」記載：「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間及雜事。……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李）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矣。」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28，頁 1016。李涪為唐末文人，《刊誤》成書年代比兩《唐書》更早，李涪應該比兩《唐書》作者容易看到更多前代的圖書，《隋書》〈經籍志〉雖未提及夏侯詠的時代，但按《四庫全書總目》來看，李涪的話應是有根據的。

67 《隋書》，卷 33 〈經籍志〉，頁 953。

68 《南齊書》，卷 39，頁 686。

69 《隋書》，卷 33，頁 983、977。

70 《隋書》，卷 33 〈經籍志〉，頁 953。

71 《南齊書》〈陸澄傳〉記載：「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隆昌

陸澄晚年或最後仕宦時的著作。陸澄兩本《漢書注》，在他去世後到唐高宗這段時間內，只有在《隋書》〈經籍志〉出現過一次。姚振宗指出：

按其後又云：「梁有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亡。」此殆從百二卷中抄出者歟？抑百二卷之外，別有此《雜注》一卷，兩《唐志》誤《雜注》為《新注》歟？⁷²

從《隋書》〈經籍志〉的記錄方式顯示，一百二卷本《漢書注》應該早已亡佚，故在《隋書》〈經籍志〉編纂時已不及見。退一步來說，從《隋書》〈經籍志〉「梁有……亡」的記載，以及從〈陸澄傳〉、當代學者，以及時代接近的記載都未再提到陸澄著作，似乎反映這兩本著作在南齊末年紛擾不斷，以及梁武帝易代的形勢下面世，以致流傳不廣。陸澄的著作在這南方內部動蕩的環境下，加上在陸澄去世同一年，南北局勢即發生鉅變，烽煙再起，這些環境對其流傳相當不利。不過，劉知幾卻似乎看到陸澄另一部一卷本的著作，他指出：「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⁷³ 從劉知幾的評論可見這部著作的內容，主要以《史記》補充，頗類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事注方式。⁷⁴ 而劉知幾對陸澄這部書的評價並不高，也多少反映出影響其書流傳不廣的一個可能原因。

從劉知幾的評論可以看出，陸澄的著作中起碼有一部與儒生注經的方式頗爲不同，而曾收藏《漢書》「真本」的蕭琛，也有一部《漢書文府》，被列爲《漢書》學者。蕭琛與沈約、謝朓、王融、蕭衍、范雲、任昉、陸倕並稱「竟陵八友」，⁷⁵ 在涉及南朝文學的論述中，蕭琛的名字經常與其他七人相提並論，⁷⁶ 但是蕭琛並沒有留下一些傳世的文學作品，反而出現有《漢書文府》

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卷 39，頁 685。

72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頁 5235。

73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上冊，卷 5〈補注〉，頁 166-167、169。

74 逢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頁 329-361。

75 《梁書》，卷 1〈武帝紀上〉，頁 2。

76 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 29。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124。Kang-i Sun Chang and

這樣的著作，於是有學者認為：「這八人並非都是文人，例如蕭琛就不以文學聞名，《隋書》〈經籍志〉也沒有著錄他的文集，從《梁書》本傳看來似乎更像一個學士。」⁷⁷不過，從蕭衍有〈答蕭琛詩〉，以及《南史》稱「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⁷⁸則蕭琛身後留下一定數量的文章詩作為不爭事實，只是《隋書》〈經籍志〉與兩《唐書》〈經籍〉、〈藝文志〉都未見收錄蕭琛文集，可見其著作應早已散佚。因此，身為「竟陵八友」之一的蕭琛撰寫《漢書文府》，從書名看來，《漢書文府》中「文府」有文章府庫之意，亦可指收藏圖書的地方，蕭琛自言「少壯三好，音律、詩、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他寫成《漢書文府》一書，應涉及文章、藏書一類事情，這仍是與他文人身分及其嗜好有關的著作。由此可見，南北朝的《漢書》研究中，除了「與《五經》相亞」的大量注解外，還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趨勢。

無論如何，陸澄逝世時，上距劉宋開國剛好七十五年。而《漢書》「真本」南傳時，更已超過八十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中，沒有任何一部《漢書》研究的著作面世的記載，如果從南北朝宏觀的角度來看，這階段前半期近八十年時間裡，可謂《漢書》研究的低潮階段。

繼陸澄之後，南朝陸續興起了一批《漢書》學者，其中有梁朝的劉顯、韋稜、劉孝標（峻）、梁元帝（蕭繹）、蕭琛、袁峻、夏侯詠，陳朝的顧野王、姚察。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到，梁朝成為整理、注釋《漢書》的鼎盛時期，在南朝十位《漢書》學者、十三本著作中，梁朝便占了七位學者，完成七本著作。由此可見，梁朝在整個《漢書》研究的復興與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環節。⁷⁹而且，相較於南方《漢書》研究的發展，北方在隋朝以前，連一本整理、注釋《漢書》的著作都沒有，因此若謂《漢書》研究變成了南北朝中期以後南方的學術特色，應不為過。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ol. 1, p. 245.

77 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0。

78 《南史》，卷 18〈蕭思話附蕭琛傳〉，頁 507。

79 李廣健，〈梁代《漢書》研究的興起及其背景〉，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65-88。

至此，可以看到南北朝的《漢書》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南北朝前半期，南北兩地都未見任何與《漢書》相關的著作，為時長達七、八十年左右。第二個階段是南朝齊末梁初湧現了一批《漢書》研究的著作，但是這階段主要集中於南方學者身上。最後，南北朝末期隋朝的學者開始加入這個隊伍，於是出現了南北學者共同研究《漢書》的情況。《漢書》「真本」出現於天監初年，恰好見證了第一、二階段的過渡。

五、結 論

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時期，也是中國學術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由於南北分治，兩地環境、條件不同，使得南北兩地的學術出現各具特色的情況。南北朝的史學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出現大量史家修史，不同題材與體裁的史著紛紛出現，研究、整理與注釋前代經典著作，也成為當時史學發展的特色。

梁朝建立時出現了一本據說是從北方南傳的《漢書》「真本」，本文試從梁朝《漢書》研究在南方大盛的框架中，來探討與這本《漢書》「真本」相關的種種問題。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的史學著作、目錄編纂、圖書藏量，南方都占多數。北方雖然在保留東晉以前的圖書上，有其先天優勢，但是在南北兩地文獻、圖書流傳過程中，大致上顯出一種由南入北的趨勢。這與北方文獻、圖書數量較少、南北雙方資訊阻隔，以及重南輕北的學術文化態度都有關係。這樣的局面，遂成為《漢書》「真本」出現的背景。

史籍記載《漢書》「真本」來自一位北方僧人手中，由梁朝學者蕭琛獲得，後來贈送給鄱陽王蕭恢之子蕭範，蕭範又轉而呈獻東宮昭明太子蕭統。這本《漢書》「真本」進入東宮後，蕭統令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等學者加以校勘，結果劉之遴將《漢書》「真本」與當時通行的《漢書》作比較後，指出其中存在十個不同的地方，並列出其中的八點。這個比較結果，成為後人了解《漢書》「真本」內容的重要管道。清朝學者根據劉之遴留下的紀錄加以發揮，邵晉涵據此寫成《四庫全書總目》的「《漢書》提目」，證明這篇《漢書》「真本」是偽作。王鳴盛認為「恐之遴等亦未能全校耳云」，顯然以為劉之遴用今本來參校異同的對象，是一部完整的《漢書》，本文從〈蕭琛傳〉、〈劉之

遜傳》的內容、《漢書》「真本」的篇幅與內容，說明《漢書》「真本」只是一篇《漢書》〈敘傳〉，不可能以之「全校」整部《漢書》。

最後，本文通過勾尋南北朝時期的《漢書》研究，指出期間《漢書》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即南北朝前半期，南北雙方都沒有相關著作的紀錄。第二階段是南朝齊末梁初，南方學者開始湧現一批《漢書》研究的學者與著作，蕭琛也是其中之一。第三個階段是到了南北朝後期，隋朝學者加入研究，出現南北學者都有《漢書》研究的著作。由此可見，南北朝時期的《漢書》研究經歷了一個低潮時期，然後大盛於梁，成為南方學者特盛的研究局面，甚至可謂南朝史學的特色之一，最終達到全國範圍的逐步擴展過程。《漢書》「真本」出現的時間，正是第一、二階段的過渡時期，這份文獻後來雖然證實為偽作，但是通過對其直接、間接的觀察，實有助進一步對南北朝時期學術、史學發展的了解。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北齊·顏之推，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收入清·潘仕成輯，《海山仙館叢書》第2函第6冊，《百部叢書集成》第60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清道光咸豐間番禺潘氏刊光緒中補刊本。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王應麟，清·公元圻等注，樂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清·翁方綱等，《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書店，2006。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收入清·顧修輯，《讀畫齋叢書》第1函第1冊，《百部叢書集成》第39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清嘉慶四年（1799）桐川顧氏刊本（甲集）。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朱祖延纂 1985 《北魏佚書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牟發松 1995 〈王融《上疏請給虜書》考析〉，《武漢大學學報》1995.5: 29-32。

牟潤孫 1987 〈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收入《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頁363-414。

李廣健 1997 〈《漢書》顏注與貞觀朝儲位之爭〉，《新史學》8.1(1997.3): 1-41。

李廣健 1998 〈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經籍志》的形成——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分析對象〉，收入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275-349。

李廣健 2005 〈許善心《七林》與南朝目錄學〉，《漢學研究》23.2(2005.12): 65-97。

李廣健 2007 〈梁代《漢書》研究的興起及其背景〉，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臺北：稻鄉出版社，頁65-88。

沈剛伯 1982 〈史學與世變〉，《沈剛伯先生文集》（上），臺北：中央日報出版社，頁63-75。

周一良 1991 〈略論南北朝史學之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77-105。

姚薇元 2007 《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段熙仲 1989 〈《水經注》六論〉，收入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3387-3453。

胡大雷 1996 《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胡寶國 2003 〈南北史學異同〉，《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86-213。

張榮芳 1991 〈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編，《第三

- 屈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青峰出版社，頁 289-311。
- 張濱生 1976 〈漢書著述目錄考〉，收入陳新雄、于大成主編，《漢書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頁 75-141。
- 曹道衡 2004 《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
- 遼耀東 1998 〈魏晉史學的時代特質〉，收入《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3-13。
- 遼耀東 2000 〈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收入《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253-276。
- 遼耀東 2000 〈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收入《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329-361。
- 劉躍進 1996 《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北京：三聯書店。
- 鄭德坤 1974 《水經注引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
- 蕭鳴籟 1976 〈《四庫提要》中關於《漢書》古本問題之附註〉，收入陳新雄、于大成主編，《漢書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頁 13-21。
- 瞿林東 1989 〈隋唐之際的《漢書》學〉，《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19-123。
- Chang, Kang-i Sun (孫康宜) and 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 eds.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Hanshu* Manuscript from the Early Liang Dynasty

Lee Kwong-kin^{*}

Abstract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Hanshu* 漢書 greatly flourished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ecoming a feature of Southern Dynasties historiograp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ang Dynasty, a Buddhist monk travelled from northern to southern China, bringing with him a handwritten manuscript. It is said that this was a manuscript of the *Hanshu*.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is manuscript, first investigating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the period's historical works, codification of bibliographies, and collections of books. Second,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dissemination, collation and content of the *Hanshu* manuscript.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studies of the *Hanshu* made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Hanshu* manuscript in southern China. In short, this research aims to clarify understanding of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Hanshu* 漢書, manuscript,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istoriography, Xiao Chen 蕭琛

^{*} Lee Kwong-k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Puli.

